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 黃克武

前言

漢語語彙中泛指當前時代的「現代」一語源於日文的漢字語詞「endai」，係翻譯自英文的 modern。此一觀念的產生與流行，曾造成近代中國歷史意識的重大轉變，並帶動歷史研究的新動向。「現代」一詞彙出現之後，在漢語語彙中又連帶產生了「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現代性」(modernity)兩詞。其中的「化」與「性」，則和中文中所有以「化」與「性」為語尾的詞彙一樣，也是從日文中引進。前者意指變化的過程，後者則指某件東西的本質、特色、特性。(註一)這樣一來，現代性一語

或普遍地指生存於現代情境之中的特質，或特定地指「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註二)現代化則是指朝向漢語的「現代」一詞，是從日文中引進。

《第二三期》2006.3.1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此一特質的變化過程。

現代性或現代化等概念之內涵非常複雜，也有不同解釋的方式，其關鍵在於對「現代」特質之認定或「現代社會」風貌之想像。例如我們可以說個人的現代性(如主體反覺)或組織的現代性(如理性的、有效的組織方式)；可以分不同的階級來討論，如資產階級的現代性、無產階級的現代性；也可以分階段來談，如 Ulrich Beck 有 First Modernity (第一現代性)、Second Modernity (第二現代性)。(註三)在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中有很多學者則談到翻譯的現代性、被壓抑的現代性或殖民主義的現代性等。本文不擬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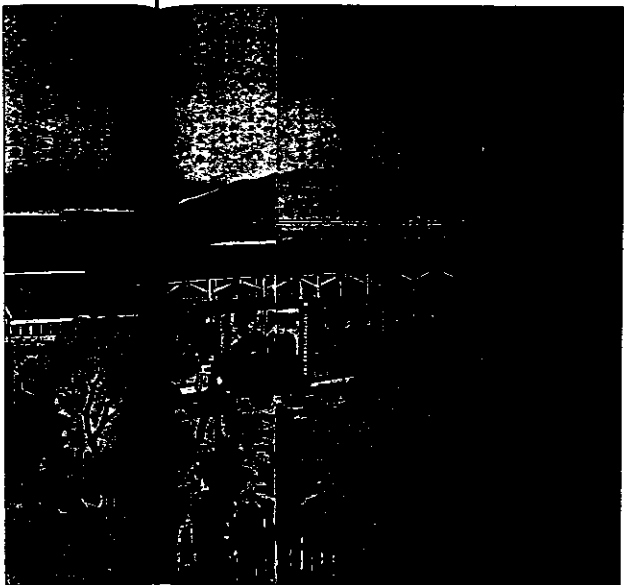
貝克(Beck)把現代分成「第一現代性」與「第二現代性」。

論現代、現代性或現代化等概念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僅嘗試將「現代」一概念歷史化，從中國近代歷史、歷史意識與台灣史學研究的脈絡，來討論「現代」、「現代化」與「現代性」等概念的出現、變遷，及其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造成的影響。

近代中國「現代」概念之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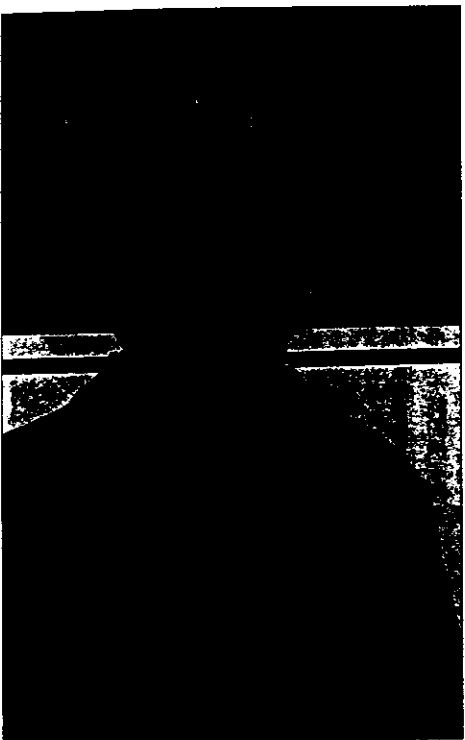
在中國傳統語彙中存有源於佛教經典的「現在」，卻沒有「現代」。(註四)中文「現代」一詞最早出現

的時間，大約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當時除了「現代」一詞之外，還使用好幾個類似詞彙來翻譯英文的 modern，如「摩登」、「時髦」、「近世」、「近代」等，至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現代」一語才變得比較普遍。一九〇二年梁啟超的《新民說》中有運用此一詞彙的例子，他說：「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力也，而一皆自條頓人發之成之。是條頓人不啻全世界動力之主人翁也」。(註五)在梁任公其他的作品之中，「現代」一詞出現得也不多，一九〇四年的《余之死生觀》中



當代

CONTEMPORARY





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由日文引介許多新名詞新觀念到中國，《新民說》中用到「現代」一詞。



與modern有關的字眼還有「摩登」、「時髦」、「近世」、「近代」。李歐梵的《上海摩登》。

有：「美國博士古士李者現代著名之哲學家也」。(註六)這兩個例子中的「現代」都指「目前這個時代」。相對來說，任公文字之中使用「近世」一詞的例子要多得多。(註七)二十世紀初期，梁任公是引領風騷的人物，許多新名詞、新觀念都是由他透過研讀、吸收明治日本的著作而引到中國。在梁任公著作之中「現代」一詞之罕見，可以反映此一詞彙尚不普遍，或者說modern和「現代」之間比較穩定的語詞對應關係，還沒有建立起來。

當時與modern相關的字眼還有「摩登」、「時髦」、「近世」、「近代」等，這些詞彙有時各有獨特的用法，有時則可相互替代。「摩登」、「時髦」和流行風尚有關，(註八)「近世」、「近代」則較常應用在討論歷史課題之上。上述這些詞彙的出現涉及到近代中國兩種思想觀念上的變化。一是受到進化論影響，出現線性的、進步的時間意識與歷史意識，「現代」意指此一發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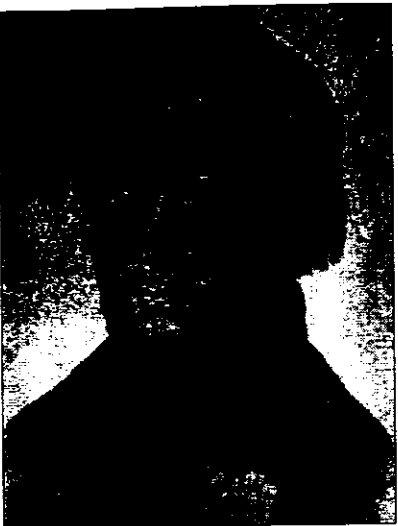
最新階段：一是對於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近代國家）之特質的掌握，在此意義之下「現代」與「傳統」，或者說西方的現代與西方的「中古」和中國的「傳統」是相對的。以上兩種觀念相互糾結，我們只能說著重不同的面向，前者偏向時間或階段的描述，後者則是揭示（在西方已經出現，而在中國尚未完成的）社會與政治理想，然兩者實難以截然劃分。

這兩種意義上的「現代」在近代中國的出現，都可以在梁任公的著作中找到端倪。有關進化論在中國的影響，以及嚴復、梁啟超居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研究，在此不必贅論。(註九)在進化論的影響之下，中國思想界突破以往流行的一些歷史觀念，如循環論（如五行終始說）、退化觀（如三代史觀），再融入中國傳統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中階段演進論（如公羊三世論），開始出現新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線性發展，逐漸進步的過程。例如，當時有不少知識分子把歷史視為「潮流」，而認為只要跟著這一個潮流前進，就會達到最終的目的。這樣的想法使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反省中國歷史。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二九〇）中，跟著西方歷史書寫方式，將中國史區分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此處之「近世」即是modern，亦即後來所通稱的「現代」，任公有關中國近世史的敘述如下：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



伯倫知理（圖）的國家學說，影響了梁啟超，認為「現代」國家出現後，人類歷史才從中古邁向近世。

之時代也。又君主專制漸就湮滅，而數千年未經發達之國民立憲政體，將燿代興起之時代也。此時代今初萌芽，雖閱時甚短，而其內外之變動，實皆為二千年所未有。(註十)

在上文中，任公認為中國的近世指的是新的歷史處境。此一處境源於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而導致政治形態的變化，亦即從君主專制逐步地轉向「國民立憲政體」。

上述以政體轉變作為「近世」之重要特徵的想法，在一九〇一年前後梁任公的著作中反覆出現。《清議報》上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是很好的例子。梁任公所寫的這一篇文章深受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國家學說的影響，將人類歷史從中世到近世的變遷扣緊在國家思想的變化之上。換言之，他認為在出現了現代國家（任公稱為「完全國家」）與國家思想之後，人類歷史才「翻開」新的一頁，從中古邁向近世。梁任公區別三種不同的國家思想：一是歐洲舊思想，以「神」為國家之主體；一是中國舊思想，以「君主」為國家之主體；一是歐洲新思想，以「人民」為國家之主體。這樣一來，歐洲新思想、新國家觀念的出現是進入近世的關鍵。任公又說，此種思想的產生，根據「天演日進之公理」，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隔之」。此一歷史演進的方向，一方面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另一方面也需要人們的努力，「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註十一)這樣的想法和嚴復在《天演論》的譯註中嘗試結合斯賓塞

《第二三期》2006.3.1

當代

CONTEMPORARY



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中國，「近代」、「近世」的觀念隨著歷史課程，成爲一個非常普遍的觀念，這時其從蔣廷黻（上）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到謝晉（下）的電影《鴉片戰爭》「近代化」問題。

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爲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

所指涉的乃中西接觸所導致的充滿災難的歷史處境。但這一課程不但要求學生認識國恥與國難，也嘗試追究造成此一情境的原因，其中最具說服力的說法是一九三〇年代「近代化論述」的出現。根據這個理論，鴉片戰爭代表了近代的西方文化戰勝了中古的東方世界，因此近百年來中國人所面對的根本問題即是「近代化」的問題。從一九三八年蔣廷黻撰寫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到一九九五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註十五）一九九七年謝晉導演的《鴉片戰爭》都表達出類似的詮釋架構。在蔣廷黻的觀念中「近代化」環繞著科學、機械與民族主義三者，他說：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一九二〇年代開始，隨著羅家倫（一八九七—一九六九）、蔣廷黻（一八九五—一九六五）以及後來的郭廷以（一九〇四—一九七五）等人在大學講授中國近代史一課，中國近代史作爲學術、教育領域的專門學科，獲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以西力衝擊與鴉片戰爭做爲論述主軸的教學科目，取得了優勢的地位。換言之，鴉片戰爭成爲中國歷史轉捩點，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即以此一戰役爲核心，著重於鋪陳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內部的情況，以及在此之後因不克求變而慘遭外侮威逼的窘境。簡單地說，中國近代史成爲「國恥史」、「國難史」。（註十四）

近百年來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爲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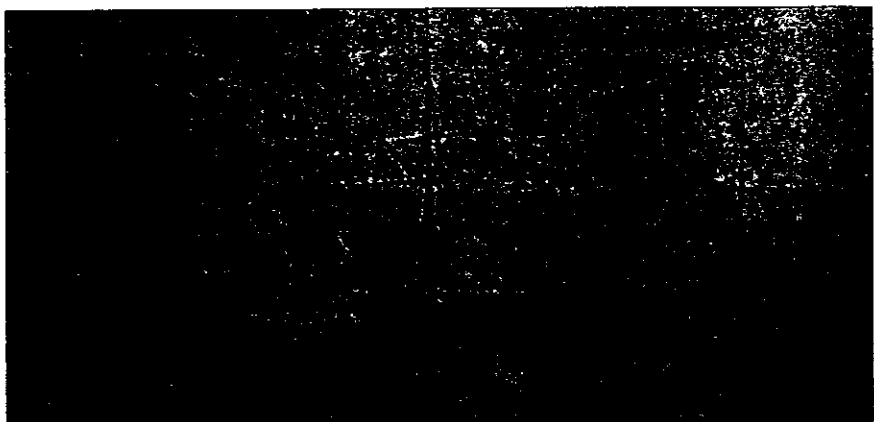
《第三三期》2006.3.1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與赫胥黎 (Thomas H. Huxley, 1825-1895) 的觀念很類似，嚴復一方面看到「任天爲治」之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於自強保種之事，反覆三致意」，認識到「天行者，以物競爲功，而人治則以物不競爲的」。（註十二）

這一種新的歷史意識成爲梁任公作品（尤其是《新民說》）的核心概念，並在近代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伴隨著此一觀念的傳播，出現了中西文明之優劣的評估，認爲西方歷史發展是「正常的」，中國歷史演變卻是「病態的」，因此中國問題的解決，需要以西方的新的現代文明徹底改造中國的舊傳統。（註十三）

以上的思想觀念不但透過知識分子的論述而流傳，同時也影響到國家的教育體制。其中「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世史」等課程，大約在二十世紀初期逐漸成形，成爲學校之中必須要教授的學科。晚清與民初，學人對於近代、近世之界定仍存著不同的視角，然大約在二〇年代後，隨著羅家倫（圖）、蔣廷黻等人在大學講授近代史，此學科才得突破性進展。



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的「近代」、「近世」指涉的是充滿災難的歷史處境。

當代

CON-Temporary



畢伯重視偶然性，但也認為「解除魔咒」、「工具理性」是重要轉捩。



海耶克認為有效的經濟發展，需要個人自由。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啟蒙運動的理念與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即將人類歷史視為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從十九世紀開始，像黑格爾、馬克思或斯賓塞等思想家，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並認為有越來越理性化的趨向。韋伯雖不強調規律性而重視偶然性，但他也認為近代西方文明中「解除魔咒」、「工具理性」的發展，是重要的軸線。二十世紀之時，中國很多思想家仍強調歷史的規律性，而歐美二十世紀的一些學者如海耶克 (F. A. Hayek, 1899-1992) 也有類似的看法。無論重視的是歷史規律性或理性、客觀性，均傾向於對文化發展採取普遍主義的觀點。這種看法也可以稱之為「合流理論」(convergence theory)。現代化理論即奠基於文化合流的觀念之上。

有趣的是，合流的看法與中國固有的「大同」的理



郭廷以企圖從歷史演變中解釋「近代中國何以落後」等問題，影響了台灣七〇年代之後的研究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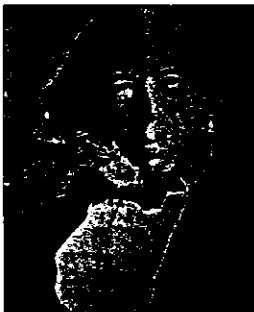
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註十六)

郭廷以繼承了上述蔣廷黻「近代化」的解釋模式，他所撰寫的〈中國近代化的延誤〉(一九五〇)、〈從中外接觸上論中國近代化問題〉(一九六七)等文，即企圖從歷史演變中解釋近代中國「何以落後？」、「何以過去數千年均能適應，而近百年不能？」(註十七)這個問題也成為他所開創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於一九五五年)。研究同仁所關懷的課題，並影響到一九七〇年代之後台灣歷史研究的方向。

現代化模式的建立

在二十世紀中文的語境中，上述對「現代」的理解有持續性的影響力，其中最重要的觀點是從一九三〇年

黑格爾(上)、馬克思(中)或史賓賽(下)等思想家，強調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並認為有理性化的趨向。



代開始，至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盛行的「現代化理論」(亦稱「近代化理論」)。(註十八)大致上從六〇到八〇年代末期，甚至九〇年代初期，台灣史學界即籠罩在現代化的研究範式之下。此一範式一方面和上述梁啟超到郭廷以的思想變化與「近代化論述」的出現有關係，

《第二三期》2006.3.1

當代

CONTEMPORARY

想有類似之處：美國社會科學界也有他們的「大同」思想。按照社會學家阿力克斯·英克爾斯 (Alex Inkeles, 1920-)，全人類將來很有可能創造出融合各種文化而形成的共同的價值系統。合流的動力是什麼？阿力克斯·英克爾斯的看法是來自豐富的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他的結論與馬克思主義幾無二致，即是強調無論文化如何不同，幾乎所有類型的心理都有一些共同的需要與能力。這些共有的特點多半環繞著物質生活，例如幾乎每一個人都熱愛健康、財富，並要避免身心痛苦，而且人們有工具理性，能發明或接受改善物質生活的方法。對很多人來說，現代化主要就是改善物質生活的改善，所以現代化在某程度上已經變成世界的潮流；此一說法與馬克思主義和英國的功利學派的觀點也很類似。依此觀點，當代世界合流的趨向環繞著現代化，而現代化的核心是經濟發展與關於生產、交通、商務和資訊等方面新的科技，以及所有這些現象結合的結果，亦



郭正昭譯的《現代化的動力》，給台灣七〇年代近代史學界相當大的影響。

總之，此書將現代化理解為：「一個社會因近代科學知識的爆發和傳播而發生的創新過程中的動態形式」，「……比較不發達的國家獲得比較發達的國家所共有的

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一種嶄新的、清晰的、完整的具有涵蓋性的概念產生了。「現代性」(Modernity)一詞漸被通用，以意指幾個在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進步的國家所具有的共同特徵而言，而達成此一進步境界的過程，即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註二十)

郭正昭譯的《現代化的動力》，給台灣七〇年代近代史學界相當大的影響。

別重要的趨向，亦即是現代社會不但越來越類似，而且越來越相互影響而糾纏不清(interconnected)。在此我們可以特別注意到各國人士在國外地區的散佈(diaspora)、英文在國際活動中的盛行以及國際網路的發展。(註十九)

在上述歷史脈絡之下，美國的學術界於一九六〇年

代開始提出現代化理論，直到今天還有一些人支持此看法。他們企圖解釋為何歐美國家結合了國族主義、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可以成功地現代化，而第三世界又何以失敗，並提出落後國家應該採行的發展方向。美國哥林斯頓大學俄國史專家C. E. Black教授所著《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1966)是此趨向的代表著作，一九七二年由郭正昭(時任職於中研院近史所)等人翻譯成中文，相當大的影響了台灣當時的近代史學界。郭正昭在〈譯者自序〉中說到他對「現代性」、「現代化」兩概念的理解：

CONTEMPORARY

當代

《第二三期》2006.3.1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美國的好萊塢電影，有世界性的影響力。校教育與教育內容的科學化等。這方面的發展與流行文化、傳播媒體的全球化有密切的關係。美國娛樂產業如



墨子刻對個人的外在自由，有「三個市場」說。

即是國民所得的提高。

這些現象也包括社會組織方面的特點。有效的經濟發展不但需要社會的專門化和區別化，也需要個人自由；此即海耶克所強調的理論，也是

最近蘇聯、東歐與中國等中國地歷史經驗給予人們的教訓。所以自由的價值，不但在理想與道德方面，也在經濟效益與工具理性方面。用香港的經濟學者胡國亨的說法，「經濟效益所需要的自由是一種「外在化」的自由，和精神方面的「內在化」自由有所不同。個人的外在的自由即是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所謂的「三個市場」：經濟市場——由個人決定要買或賣什麼東西；思想、知識、資訊流通的自由市場——由個人決定要研究什麼想法或肯定什麼觀念；政治市場——由個人決定要支持哪一個政治主張或政黨。雖然政治市場不一定會發展為完善的民主，經濟與行政的效率還是需要某種程度在單位與群體之間的比賽與制衡，所以中國也開始有地方性的選舉，但未來不一定走向英美或台灣式的民主。除了上述環繞著工具理性、經濟發展與社會組織的合流趨向，現代化也包括價值取向方面的合流，尤其是重視個人尊嚴、自律、成就感、合作精神，以及強調學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民所得」等。(註二三)此一研究取向自八〇年代以來，仍影響著中國中國學界有關「現代化」的研究，比較重要的學者是已經過世的北大教授羅榮渠(一九二七—一九九六)。近年來張明園有關現代化的著作在中國重印，並受到歡迎，可以反映此一議題在中國史學界仍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韋伯看到的理性化過程？沒有工業革命？資本主義？

有其活力。(註二四)

現代化計劃的參與者所問的問題也可以說是韋伯式的問題。當現代化理論盛行之際，台灣、中國先後出現韋伯熱，並不是孤立的現象。韋伯認為傳統到現代是理性化的變遷，他在西方歷史中特別發現理性化的發展，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史，要問：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韋伯所看到的理性化過程？例如探討為什麼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革命？為什麼中國官僚制度是特殊的形態？官僚制度裡君王到底具有「任意的權力」(arbitrary power)，還是會受到制度的制衡？在六〇—九〇年代中外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幾乎都籠罩在此類的問題意識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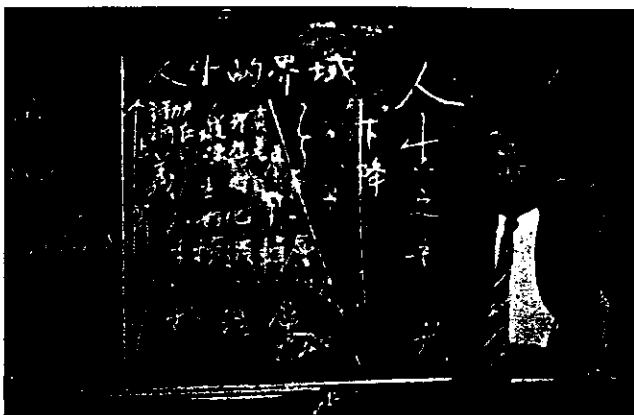
大概到七〇、八〇年代，現代化理論開始受到了一些衝擊，到今日有些人認為現代化的研究已經過時了。他們覺得此一理論傾向於將傳統、現代作二元對立，而且認為所謂的指標、計量的研究方式，是單一線性的，以西方模範為中心的研究視角，更認為這樣的視角具有侷限性與階級壓迫性，有必要加以反省。此一「現代化理論的批判」有多種來源，但主要受到馬克思主義、新左派以及後現代、後殖民等思潮的影響，並使人們對現代性的概念有了新的認識。金耀基對此有簡要的說明：

「現代化理論」在五、六〇年代盛極一時，七〇年代後則開始受到質疑，引致不斷爭議，最後則減退了它的吸引力。現代化理論之所以由盛而衰，不止由於來自學術上的挑戰，也緣於來自現實世界實踐的反彈，在現代化如火如荼發展的過程中，發達國家中出現了「去現代化」

CON-TEMPORARY

當代

《第三三期》2006.3.1



殷海光強調
現代化是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

特徵，這種社會變遷底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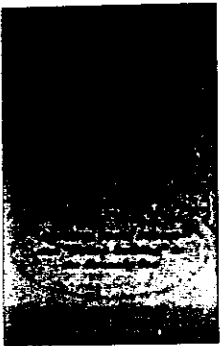
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台灣學者不但透過翻譯引介現代化理論，也分別從史學及社會科學探討中國現代化問題。這些作品包括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金耀基的《從傳統到現代》、《現代人的夢魘》；李亦園

的《人類學與現代社會》以及他與楊國樞合編的《中國人的性格》、韋政通的《現代化與中國的適應》等書。(註二一)這些作品共同強調現代化是中國文化的唯一出路，而台灣在此過程中背負了特殊的使命。

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朋園所領導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繼承郭廷以的史學關懷並結合了美國的現代化理論，開始分省探討中國各個地方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張朋園回顧此一研究計劃說：

一九六〇年代同時盛行著「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思潮。一個國家要現代化，必須有經濟成長、社會繁榮、政治民主。這原是用以觀察第三世界未能及時發展的三大函數，借用過來觀察十九、二十世紀中國衰弱的究竟，再好不過。一九七二年我與一群理念相近的學者承擔了「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畫……我們將全國分為十七個區域。(註二二)

他們的架構大致如下。首先認定「現代化就是現代性(modernity)與傳統(tradition)的交替過程」，因此第一步探討何謂傳統社會，第二步探討西方的衝擊，接著從社會、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探討現代化的進程，也思索傳統跟現代化的關聯，例如「儒家思想是否利於發展」以及各種「難以現代化的原因」。在方法論方面，他們吸收了西方現代化理論，採用一些「指標」作為研究的基準，例如「人民對於新事物與大眾傳播的接觸、居住處所的改變、識字率、城市人口、非農業人口、國



Latham的《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
即是從左派觀點看
現代化理論。



孔恩從科學史研究，提出「與範論」。



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反現代化」運動，生態與地球意識興起。

軸的資本主義形態)為最後模型的思想方式，也即是西方的「特殊主義的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 of Particularism)。現代化理論這個「種族」文化的中心觀，不止使現代化運動在非西方社會引起抗拒與挑戰，而且連「現代性(modernity)」這個概念之正當性與可欲性，也產生疑問。(註二五)

多元現代性的反思

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美國學界不但開始批判西方中心的「現代化理論」，也提出了替代性的多元現代

(de-modernization)現象，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反現代化」(counter-modernization)運動。生態環境的危機、地球意識之興起，是對浮士德式「敢將日月換新天」的現代化精神所造成「發展悲劇」的反應。在學術上，現代化理論受到種種挑戰，在根本上，現代化理論所採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論的實證主義已因科學哲學新觀點之出現而動搖，社會科學中「詮釋學的轉向」(hermeneutic turn)使現代化理論在學理的訴求上受到冷落，另一個關鍵性的挑戰則是「現代化理論」背後的「西方中心觀」(或更確切地說「美國中心觀」)的偏執。毋庸諱言，現代化理論自覺地與不自覺地有種以西方特定時空中的社會形態(以自由主義的民主原則為主

性(multiple modernities)、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等觀點。此發展和左派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有密切的關係，他們認為現代化理論並不是普遍的，故諸四海皆準的發展理論，而是宣揚西方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以及英美式的自由民主政體的理想，甚至和美國帝國主義的文化宣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Michael Latham在*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2000) (《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的分析可以配合此一觀點。(註二六)強調現代化理論跟冷戰時期美國國家政策和學術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聯性。簡單地說，他覺得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發展了自由主義的理論，為了開發中與未開發

《第三三期》2006.3.1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國家設立了策略的理念和行動方案，而這些方向其實和冷戰時期美國帝國主義的國家發展是結合在一起的。同時，他也指出當時自命為追求知識客觀性的美國社會科學家，其實沒有意識到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追隨者、鞏固者。這樣的研究取向無疑地受到「知識社會學」的影響，更植根於西方文化中左派與右派的爭論。從左派的觀點來看，現代化理論太偏向美國帝國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資產階級、跨國公司等大企業的利益。

也有人從此一角度，來分析、批判台灣接受現代化理論的背景。例如人類學者艾琳達即抱持此一觀點：她的立場和Latham很類似。一九七〇年代她在台灣「看到美國的跨國公司利用台灣的戒嚴法處理台灣勞工問題，也看到了台灣的政治犯與白色恐怖現象」，她說：「回到美國後，意識形態有了轉變，我開始讀左派的書籍：人類學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已經被我視為美帝的宣傳品」。(註二七)她並批判台灣的現代化理論配合了冷戰美國帝國主義的發展，從而使台灣成為其中的一環，她認為當時台灣為什麼要接受美國這套

理論。實際上台灣是美國帝國主義在冷戰時期的受益者。當時美國花了很多錢發行《今日世界》雜誌，用意在宣傳美國作為現代國家是什麼樣，而讓台灣成為整個佈局裡的一環。現代化理論正配合了此一發展趨勢。艾琳達無疑是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學者，她從此一角度把現代化理論放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之下，視為中國國民黨主政時期的國家利益、反共心態與美國帝國主義的發展結合在一起的意識形態。

現代化理論不但受到左派的批判，也和西方知識界對知識客觀性的反省有關。上述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以及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從科學史研究所提

出的「典範論」，都反映此一學術趨勢。這一思路源於以笛卡兒、休謨、康德、尼采、韋伯、波普、維特根斯坦和柏林等思想家為代表的西方認識論大革命，及革命之後出現的「悲觀主義的認識論」。(註二八)

這種看法認為一個人所秉持的觀念或「知識」，跟這個人所依賴的「歷史性話域」或「知識譜系」有密切的關係。據此，無論是康德、牟宗三或任何一個沒沒無聞的人，思考時所依賴的規矩，是歷史過程的產物。這樣一來，決定一個命題有沒有道理之時，人們關於道理的定義，不可能完全配合普遍性的真理、邏輯、理性或道德，而要着他們主觀的認知中，有哪些從歷史背景中繼承而來的思想預設。這些從歷史背景繼承而來的預

設，不但包括從文化來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模式或價值取向，也包括時代的意識形態。(註二九)

近年來興起的後現代、後殖民主義都從此一角度批評啟蒙時代以來對理性之普遍性的信心。在這種觀念之下，於是將現代化理論視為西方中心的觀點，企圖使其他國家接受歐美的發展模式，並從而穩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球競爭上的霸權地位。

在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的批判之下，現代化的研究範式在九〇年代開始不再一枝獨秀。近年來在中國近史的領域之內，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現代性」(modernity)的問題。中外學界開始以「現代性」作為研究課題，並出版專書：中文方面，李歐梵的論文集稱

由金觀濤(上)、劉青峰(下)策劃的書壇論文集及其他多位學者著作，可見「現代性」已取代了「帝國主義批判」、「西方衝擊說」等概念。



《第二三期》2006.3.1

當代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為《現代性的追求》(一九九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由金觀濤、劉青峰策劃的會議論文集名為《自由主義與中國現代性的思考》(二〇〇二)；英文方面則有Frank Dikötter的*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1995)、Lydia H. Liu (劉禾)的*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Tim Oakes的*Tourism and Modernity in China* (1998)、Michael Ts'in的*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Canon, 1900-1927 (1999)；以及葉文心所主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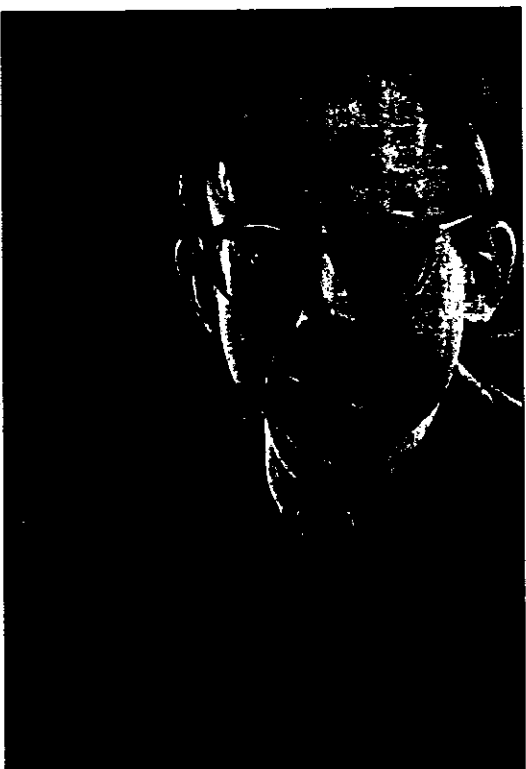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2000)等書。此一用詞的普遍出現，顯示中國「現代性」已經取代了一九六〇、七〇年代以來，目的論式並具有西方中心色彩的「西方衝擊說」、「現代化」、「帝國主義剝削」等概念，成為學術討論的核心。

當中國不再以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的「現代性」當作唯一的、普遍的、正常的生活模式之後，歷史的視野就不再限於以指標或階段性的歷史定位，來衡量中國模仿

西法的成就，或自卑地追尋未能實現西式理想的緣由。這也意味著即使在西方，現代性的發展也不是單一的。最近幾年中西學者開始思索「文明衝突論」(杭廷頓的觀點)、「另類現代性」與「多元現代性」、「殖民主義的現代性」等議題，及反省上述線性歷史觀，並進而認識到西方歷史經驗的局限性與複雜性有密切的關係。在此理念之下，中國現代性不但是現實的生活處境，有其內在的發展理路，也是中、西歷史、文化交融互釋之產

抗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意味著即使在西方，現代性的發展也不是單一的。

CON-TEMPORARY



物。中國現代性有何特色，又與西方或其他文化中的現代性有何不同？在「翻譯」西方現代性（或經由日本學術界認識西方現代性）的同時，是否也誤解、排斥與批判「現代性」？這些問題都值得從不同面向來加以思索、探究。

二〇〇二年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可以反映一種新的問題意識。研討會嘗試從日常生活與知識生產兩個面向來理解中國現代性問題（也包括台灣「殖民主義的現代性」以及日本對中國現代性生成之影響等）研討會特別關心的議題是，在「現代」的處境之下，日常生活的實踐面發生了何種變遷？其歷史背景為何？日常生活又如何與知識交織互動，衍生出精神與物質方面的變遷？此處所指的日常生活是以衣食住行育樂等物質性的面向為主，然而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無法斷為兩個，物質生活的變遷往往伴隨著精神上的重大變革，而精神的內涵不限於理性的追求，也包括情感的發抒或情理之交融。換言之，日常生活變遷的背後，實透露出認知世界方式的重大變化，在此理念之下，消費活動可以具有安身立命、死生與之的終極意義。由此可見西方心物、主客、理性與終極關懷等二元分裂的思維模式，有其限制。

研討會所關心的知識面向的議題，即是「認知世界」的基礎。就此而言，知識與其說是普遍的、永恆的解釋或改造世界認知體系，還不如說是由特定人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產品，其流通則涉及了知識的生產者、傳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換言之，知識是理性與歷史

交織而成的悖論性過程，不一定配合普遍性的真理。西方現代知識引進中國所形成的歷史性話域與實踐，是很好的例子。譬如西方科學知識的傳入一方面促成學科體制的形成與專業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又與本土的知識體系相互激盪，而產生中西交融的新的認知體系，認知體系又轉而影響到日常生活的實踐。總之，生活與知識的滲透、衍展成為中國現代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忽略的面向。（註三十）

在這股浪潮之下台灣的史學界也開始走向所謂的後現代史學，或者說從過去的「韋伯熱」到「傅柯熱」，甚至有人談到中國史研究的「傅柯化」。在王晴佳、古偉瀛編的《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談到有些學者開始批判所謂「大歷史」、「主流論述」，在中國史的領域裡則特別批判五四為中心的「啓蒙論述」。（註三一）在中央研究院的主題計劃中開始研究「性別」、「情欲」、「身體」、「記憶」、「鬼神」、「翻譯」等課題，這在八〇年代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無論如何，以西方、理性發展、支配階層、男性等為中心的主流論述受到強烈的質疑，學者開始從邊緣、弱勢、下層等立場出發，重新思考多元發展的歷史過程。

在華語學界，多元現代性的想法不但激勵出豐富的史學想像，因為歷史論述涉及現實意涵，也使之具有社會批判的性格，幫助人們思索如何追求社會正義與未來規範性的發展，難怪學者指出「現代性內部其實蘊藏著豐富的批判能量」。（註三二）如何依賴此一批判能量建立「相互的主體性」、「互相認可」的歷史，但同時避免另類的獨斷與烏托邦主義的危險，值得進一

《第三三期》2006.3.1

當代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步思索。

結語

指涉當代之歷史階段與生活之特質的「現代」、「現代性」、「現代化」等概念有非常豐富的意涵，本文無法全面剖析此一觀念，只嘗試從近代中國思想史、史學史的角度來談這些詞彙的意義，及其對近年來台灣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影響。這些具有高度時間感、自我定位，並與未來理想相糾結的觀念，本身即經歷了歷史的過程而改變其內涵，最基本的變化是從普遍性、一元性，走向特殊性與多元性。從以西方經驗為模型，結合民族國家、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形態走向更具批判精神、更開放、更包容的格局。在歷史研究的課題上，因而激勵出豐富、多元的研究視角。此一觀念也認識到人

類歷史除了合流的趨向之外，也有分流的趨向，並不斷地出現杭亭頓所謂因文化差異導致的國際衝突。但是批判過現代化之後的現代性，如果不是英、美的模式或日本模式，究竟為何，有無可能建立不以「發展」、「適應」，或不依循資本主義所強調的效率、利潤為目標的模式？在中國文化的範圍內什麼才是現代性的生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台灣模式，或新加坡模式。這一些規範性的問題，無疑地很難尋得共識，然現代性概念中所蘊含的批判能量，應該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問題的本質，並在處理生活幽暗面所引發之問題中，尋求可能的進步。（本文曾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二〇〇五年五月二七、二八日舉辦的「公民社會基本政治與社會觀念」工作坊中宣讀，承蒙與會學者的批評指正，謹致謝忱。）

（註一）：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348-9.

（註二）：黃瑞祺，〈現代與後現代〉（台北：巨流，二〇〇〇），頁一七。

（註三）：Beck的討論涉及歷史記憶與現代性之關連，他認為第一現代性是英雄的、主動者的論述，同時在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充滿誤解與相互的不滿；而第二現代性則是基於雙方相互認可可

者 (the Other) 歷史之間的妥協。Ulrich Beck, "The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The Sociology of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1:1 (2000), pp. 79-105.

（註四）：《俱舍論》，「若已生而未已滅名現在」。

（註五）：梁啟超，〈大漢和辭典〉（台北：中新，一九七九），冊七，頁九二一。

（註六）：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一九七八），頁八。

（註七）：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台北：台灣中華

華書局，一九七八），一七：五。

(註七)：《新民說》中「近世」有九個例子。

(註八)：「摩登」是高度商品化的文化建構，有關此一詞彙在中文方面的討論有李歐梵的研究，他說「英文modern (法文 moderne) 是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個譯音……中文「摩登」在日常會話中有「新奇和時髦」義。《李歐梵自選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頁一九三。此一觀念在日本的情況，尤其是與現代女性之關連，見Miriam Silverberg, "The Modern Girl as Militant," in Gail Lee Bernstein, ed.,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 1600-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39-266.

(註九)：較重要的是：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James Reeve Pusey, *Lu Xun and Evolu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張朋園，〈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啟超的進化觀〉，《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二)，頁八五—一二二。

(註十)：《飲冰室文集》六：一一。

(註十一)：《飲冰室文集》六：一一、一三。

(註十二)：嚴復譯，《天演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自序〉，頁三；〈導言六〉，頁一六。

(註十三)：見拙作《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

思想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四)，頁一二—一二二。民初五四運動的支持者如胡適、陳獨秀與魯迅均秉持此一觀點。這一看法也與西方學者如韋伯的看法相呼應。

(註十四)：劉龍心，〈中國近代史——門次學科領域的興起〉，《郭廷以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二〇〇四，一：十一—十二。張海鵬曾蒐集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所編纂的中國近代史之書目，共有七十九種，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一〇年由北京漢英圖書館出版，陳光憲編著的《中國近世史》，張海鵬，〈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史書的編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研討會論文，二〇〇五，十一：十六。

(註十五)：茅海建說「鴉片戰爭給中國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離這一軌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五)，頁五七八。

(註十六)：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台北：啓明書局，出版時間不詳)，頁一。

(註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國的變局〉(台北：聯經，一九八七)。

(註十八)：有關一九三〇年代開始「現代化」在中文世界的使用狀況，可參閱潘光哲，〈想像「現代化」：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新史學》，卷十六期一(二〇〇五)，頁八五—一二四。

(註十九)：墨子刻，〈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路向——必

《第三三期》2006.3.1

當代

「現代」觀念之源起與歷史研究的本土反思

CONTEMPORARY

然的趨向與自由的範圍》，《學術思想評論》，輯四(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

(註二十)：郭正昭，〈譯者自序〉，C. E. Black, 《現代化的動力》(台北：寶宇，一九七四)，頁三三。

(註二一)：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香港：大通書局，一九八一)；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九)；《現代人的夢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李亦園，〈人類學與現代社會〉(台北：牧童，一九七五)；李亦園與楊國樞合編，〈中國人的性格〉(台北：中研院民族所，一九七二)；韋政通，〈現代化與中國的適應〉(台北：牧童，一九七六)。

(註二二)：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一八六〇—一九一六——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二)，頁一、六。

(註二三)：黃瑞祺很詳細地談到現代化的各種指標，《現代與後現代》，頁二二。

(註二四)：張朋園，〈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展(一八六〇—一九一六)〉(長沙：岳麓書社，二〇〇三)。

(註二五)：金耀基，〈從「現代化理論」的爭議到「現代性」之批判與探索〉，《中央研究院週報》，期五八一(一九九六)。

(註二六)：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雷迅馬著，牛可譯，〈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二)。

(註二七)：陳儀深訪問、周維朋紀錄，〈艾琳達(Linda Gail Arigo) 女士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編，《口述歷史》，期十二(二〇〇四)，頁四五。

(註二八)：墨子刻教授語，請參閱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新出版的英文專著：《太平洋風雲：評當代中西政治理論之爭》(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

(註二九)：墨子刻，〈道統的世界化：論牟宗三、鄭家棟與追求批判意識的歷程〉，《社會理論學報》五：一(二〇〇二)，頁八一。

(註三十)：這一次研討會的成果見：《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四一(二〇〇三)，以及Peter Zarrow, ed., *Creating Chinese Modernity: Knowledge and Everyday Life, 1900-194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註三一)：王晴佳，古偉瀛編，〈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二〇〇〇)。

(註三二)：錢永祥，〈現代性業已耗盡了批判意義嗎？汪暉論現代性讀後有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三七(二〇〇〇)，頁七五—九〇。

